

# 政府质量对公民参与倾向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宋 典 芮国强 丁叙文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政府质量、政府信任等变量的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深度剖析了政府质量、政府信任以及社会责任感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机制和原理。研究表明:政府质量和政府信任是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关键变量,对公民参与倾向有直接影响。另外,个体社会责任感不仅会负向调节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关系,还会削弱政府信任在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政府质量发挥治理作用的复杂机制,为政府质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关键词** 政府质量 政府信任 公民参与倾向 社会责任感

宋 典,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15021

芮国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通讯作者 215021

丁叙文,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15021

## 一、引 言

公民参与已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普遍范式,对公共服务和决策效率均有促进作用,可部分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缓解政府资源和注意力有限的压力<sup>[1]</sup>。多国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质量提升路径研究”(16AZZ014)、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人才优先引领创新发展研究”(16ZHB003)阶段性成果;同时受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15ZSTD010)资助。

[1]Rikki Dean, “Control or Influence? Conflict or Solidarity? Understanding Diversity in Preference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olicy Decision Making”, *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ve*, 2019, 53, pp.170-187;李庆钧:《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作用及其限制性因素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动公民广泛参与公共管理<sup>[1]</sup>。当前,我国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sup>[2]</sup>,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的政府去引导<sup>[3]</sup>,而高效政府的建设需要广泛的公民参与作为支撑。为此,我国各级政府正在加快建设高质量政府,旨在提高政府信任,促进公民参与,提升治理绩效<sup>[4]</sup>。

公民参与的前提条件是个体具有较高的参与倾向,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因素分为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启动因素有价值观和工具性动机,维持公民参与倾向的因素有积极体验,提升公民参与倾向的因素有公民自尊的增强和技能的发展<sup>[5]</sup>。也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内外在动机、收入、政治兴趣、主观规范等变量也会影响公民参与倾向<sup>[6]</sup>。在国家层面,政治文化、政府信任、腐败、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等因素会影响公民参与倾向<sup>[7]</sup>。

截至目前,学界探索政府质量影响公民参与倾向机制的研究并不多,也鲜有探讨政府质量与个人社会规范交互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论述。为此,本文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以个人社会责任感为调节变量,剖析政府质量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原理,揭示政府质量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边界条件,尝试构建一个涵盖政府能力、个人价值观等多个变量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理论框架,以期丰富和深化公民参与理论研究。

## 二、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劝说、线索和论证

政府质量是反映国家治理水平的主要指标<sup>[8]</sup>,其研究肇端于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此后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将评价“善政”的政府质量概念推向前台<sup>[9]</sup>。政府质量是一个国家权力运行的惯例和制度,包括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公民对政府管理国家制度的尊重。政府质量的核心是“非偏倚性”,主要是指政府机构的公正性<sup>[10]</sup>。在整合过往研究的基础上,Agnafors认为政府质量

[1]Ploy Suebvises, “Social Capita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in Thailand”,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9, pp.236-248;董石桃:《公民参与的价值认知及其发展——基于西方行政思想史的考察》,〔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7期;金桥:《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刘志彪:《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上海〕《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

[3]曹堂哲:《打造政府绩效管理升级版 全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1期。

[4]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北京〕《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

[5]〔加〕S.马克·潘什:《公民权与公民参与心理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6]Lisa Schmidhuber, Frank Piller, Marcel Bogers, Dennis Hilgers,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vestigating Open Government for Social Innovation”, *R&D Management*, 2019, 49(3), pp.343-355; Milena I. Neshkova, Vaiva Kalešnikaitė, “Corrup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Governance*, 2019, 1, pp.1-17.

[7]王正绪、叶磊华:《东亚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北京〕《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吕书鹏:《不同政府信任类型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第三波 ABS 数据的实证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8]臧雷振、徐湘林:《政府质量:国家治理结构性指标研究的兴起》,〔北京〕《公共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

[9]聂平平、万苏春:《国外政府质量研究:话语阐释、测评指标与研究困境》,〔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0]Kaufmann, D., Aart, K., Pablo, Z., “Governance Matter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9, No: 2196; Rothstein, B., Teorell, J.,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12(1), pp.690-694.

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保持公正性、响应性等方面的情况<sup>[1]</sup>。当前,理论界对政府质量的概念已基本达成共识,强调它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构念,既可用政府效率、财产保护等指标进行测量,也可从公民感知的角度进行测度<sup>[2]</sup>。研究表明政府质量对公民幸福感、社会资本、政府支持度等有积极影响<sup>[3]</sup>。

公民参与是公民分享行政机构的部分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sup>[4]</sup>。随着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公民参与的形式更加丰富<sup>[5]</sup>,可通过咨询、听证、建议等方式参与公共管理<sup>[6]</sup>。多数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均假设个体先天具有很强的公民精神,会密切关注公共利益,然而有研究发现民众时常会缺乏参与倾向<sup>[7]</sup>。具有较强的参与倾向是公民参与的前提条件,据此,部分学者对公民参与倾向进行了分析。李春梅认为公民参与倾向是个体在社会关怀、时事关心和社会责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主动性<sup>[8]</sup>。林嘉诚认为公民参与倾向是公民责任、政治信任感、政治疏离感等方面的映射<sup>[9]</sup>。简言之,公民参与倾向是公民在参与政府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公民参与倾向本质上是一种内隐的态度,依据详尽可能模型,个人态度的形成会受到劝说论述、外围线索和论证细节倾向等因素的影响<sup>[10]</sup>。劝说论述是指个体态度会受到其他主体劝说的影响;外围线索是指态度会受有吸引力的消息来源、情感、社会角色等因素的影响;论证细节是指个体态度的形成会受其对观点或评论进行验证倾向的影响<sup>[11]</sup>。从劝说论述来看,质量较高的政府,动员能力比较强,其经常会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体让公民知晓公共政策设计的缘起、进程、方案选择等方面的信息,愿意让公民参与政府管理,会劝说公民参与公共问题的论证、决策等过程,且给公民提供多样的参与渠道,公民参与的顺利程度会相对较高,公民持续参与政府事务管理的倾向也会更高<sup>[12]</sup>。从外围线索来看,质量较高的政府给公民提供的信息线索比较丰富且可信性高,例如会非常关注公民权益,向公民

[1]Agnafors, M., "Quality of Government: Toward a More Complex Defin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3, pp.433-445.

[2]Alesina, Alberto, E., Zhuravskaya, "Segreg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5), pp.1872-1911;王永杰、曹静:《文化与制度因素对政府质量感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比较》,〔哈尔滨〕《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12期。

[3]Helliwell, J. F., Huang, H., "How's Your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38(4), pp.595-619; Knack, 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WP", *Annali Italiani Di Chirurgia*, 2002, 46(4), pp.772-785; Mungiu, A., "Corrup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6, 17(3), pp.86-99; Charron, N., Dijkstra, L., Lapuente, V., "Regional Governance Matters: Quality of Government within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Regional Studies*, 2014, 48(1), pp.68-90.

[4]Nancy Roberts, "Public Deliberation in an Age of Direct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4, 34(4), pp.315-353.

[5]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北京〕《学习时报》2006年12月8日。

[6]夏晓丽:《当代西方公民参与理论的发展进路与现实困境》,〔哈尔滨〕《行政论坛》2014年第4期。

[7]Lawrence C. Walters, James Aydelotte, Jessica Miller, "Putting More Public in Policy Analys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0, 60(4), pp.349-359.

[8]李春梅:《城镇居民公众参与认知、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版,第54页。

[9]林嘉诚:《政治心理形成与政治参与行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41页。

[10]Cacioppo, J. T., Petty, R. E.,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84, 19(4), pp.123-205.

[11]Lewis R. Aiken, *Attitudes and Related Psychosocial Constructs: Theories,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2-45.

[12]许凌飞、彭勃:《从权利到知识:公民参与研究的视角转换》,〔北京〕《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提供丰富的即时信息。在此情境下,公民参与的倾向会比较高;而低质量的政府则对公民参与持消极态度,个人能从政府获得的信息比较少,公民参与倾向相应较低<sup>[1]</sup>。从论证细节来看,高质量的政府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有效地将公民关心的事项转变为公共政策并付诸实践,解决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给公民带来福祉,公民在论证其参与问题时会有更多的依据和动力,对参与流程、目标等问题有更清晰的认知,公民参与的政治自我效能感会得到提升,公民参与倾向也会提高<sup>[2]</sup>。综合以上论述,提出假设1:

H1: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正相关

### 三、政府信任:政府质量对公民参与倾向影响的传导机制

政府信任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构成<sup>[3]</sup>,是指公民对政府机构仁慈、能力和忠诚三方面的感知和评价<sup>[4]</sup>。仁慈是指公民认为政府真正关心他们的程度;能力是指公民对政府执行、突发事件应变等能力的评价;忠诚是指公民对行政官员履职和廉洁情况的感知<sup>[5]</sup>。制度解释理论认为政府绩效是政府信任的源泉<sup>[6]</sup>。政府绩效主要包括自身管理、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绩效。自身管理绩效是指政府在决策透明度、依法行政、抑制腐败等方面的表现,高质量的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会比较好,已有研究显示政府透明度、依法行政与政府信任显著正相关<sup>[7]</sup>。与此相反,腐败对政府信任有明显的侵蚀效应<sup>[8]</sup>。社会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治安、社会分配、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管理表现。研究显示机会、收入公平感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分配正义感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sup>[9]</sup>。质量高的政府能够建立正式的公平制度,提升公民的政府信任感<sup>[10]</sup>。经济绩效是指政府在GDP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管理情况<sup>[11]</sup>。影响政府信任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情况,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众对政府满意度高,信任度随之提升<sup>[12]</sup>。综合而言,高质量的政府通过向公民展现高效的管理能力、公平有效

[1]郝斌、孟育萱:《政府质量如何影响居民迁移: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大连〕《财经问题研究》2017年第11期。

[2]Jennifer Duffield Hamilton, Caitlin Wills-Toker, "Reconceptualizing Dialogue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6, 34(4), pp.755-775.

[3]芮国强、宋典:《信息公开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1期。

[4]Houston, D. J., Harding, L. H.,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ors: Explaining Citizen Perceptions of Trustworthiness and Competence", *Public Integrity*, 2013, 16(1), pp.53-75.

[5]Grimmelikhuijsen S, Porumbescu G, Hong B, "The Effect of Transparency on Trust in Government: A Cross National Comparative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3, 73(4), pp.575-586.

[6]Miller, A. H., Borrelli, S. A., Miller, A. H.,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During the 1980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1991, 19(19), pp.147-173.

[7]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北京〕《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8]Anderson, C. J., Tverdova, Y. V. "Corruption, Political Allegiances, and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3, 1, pp.91-109; 吴进进:《腐败认知、公共服务满意度与政府信任》,〔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9]麻宝斌、马永强:《公众分配正义感受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北京〕《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10][瑞典]罗斯坦:《政府质量:执政能力与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蒋小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11]Riccardo Crescenzi, Marco Di Cataldo, Andrés Rodríguez-Pose, "Government Quality and the Economic Return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EUROPEAN Region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6, 56(4), pp.555-582.

[12]Miller, A. H., Borrelli, S. A., Miller, A. H.,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During the 1980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1991, 19(19), pp.147-173.

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绩效,交互作用提高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sup>[1]</sup>。

政府信任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会对公民的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民参与倾向<sup>[2]</sup>。这是由于政府信任会促使个体认为政府会尽力提高他们的福利,认为政府具备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的精神。作为回报,公民会更多地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相信自己参与公共事务能得到政府较好的配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得以提升。由假设1可知政府质量会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倾向,而由前述可知政府质量会影响政府信任,政府信任也会影响公民参与倾向,据此提出假设2:

H2:政府信任是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中介变量

#### 四、社会责任感:政府信任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情境考察

社会责任感是个人作为社会一分子应当对国家或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感知,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品质<sup>[3]</sup>。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情感可促使个体自觉履行某种义务,主动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等行为。与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相比,社会责任感更具主观能动性,它可以通过增加利他行为与奉献意识来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sup>[4]</sup>。社会责任感是一种主观规范,反映了个人准备扮演的社会角色。依据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规范是影响个人意图和行为的重要变量<sup>[5]</sup>。个体的社会责任感越高,他越感觉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公民捐助、帮扶他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行为就会越多。可以推断,假如公民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并非常信任政府,那么公民参与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倾向会更高。据此,提出假设3:

H3:社会责任感正向调节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关系,即在个体社会责任感高的情境下,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关系更高,反之亦然

综合上述假设,研究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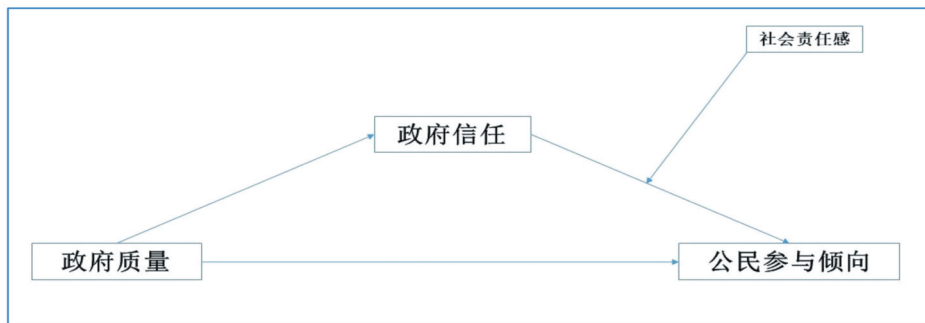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图

[1]朱春奎、毛万磊:《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张川川、胡志成:《政府信任与社会公共政策参与——以基层选举投票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为例》,《经济动态》2016年第3期。

[3]黄四林、韩明跃、孙铃、尚若星:《大学生公正感对其社会责任感的影响——社会流动信念的中介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4]Wray-Lake L., Syvertsen A. K., Flanagan C. A., "Developmental Change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Adolescence: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6, 52(1), pp.130-142.

[5]Ajzen, I., Fishbein, M.,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7, 84(5), pp.888-918.

## 五、政府质量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首先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邀请朋友填写纸质问卷,其次在社区、公共广场等区域随机调查部分市民。调查时间为2018年5月至12月,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7份,删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12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3.45%。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统计量		人数(位)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女性	55	70	44.0
教育程度	硕士及以上	本科	13	75	10.4	60.0
	大专	中专及以下	22	15	17.6	12.0
职业	党政机关	企业单位	2	63	1.6	50.4
	事业单位	离退休	18	2	14.4	1.6
	其他		40		32.0	
政治面貌	党员	群众	39	86	31.2	68.8
月平均收入	4000元及以下	4001-8000元	37	62	29.6	49.6
	8001-12000元	12001元及以上	20	6	16.0	4.8
在本市居住时间	1-5年	6-10年	34	12	27.2	9.6
	11-15年	16-20年	6	5	4.8	4.0
	20年以上		68		54.4	

各变量的度量均采用Likert7等级法,由于公民参与倾向等概念比较抽象,为了调查研究的针对性,本研究主要以公民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为调查域来反映政府质量等变量对公民参与倾向的影响。公民参与倾向借鉴了李春梅的量表<sup>[1]</sup>,分为公共事务和关心时事两个维度,各三题,公共事务维度的 $\alpha$ 值为0.787,C.R值为0.795,AVE值为0.571;关心时事的 $\alpha$ 值为0.874,C.R值为0.871,AVE值为0.693;公民参与倾向的整体 $\alpha$ 值为0.906,C.R值为0.910,AVE值为0.634。社会责任感借鉴了陈良煌的量表<sup>[2]</sup>,共三题,它的 $\alpha$ 值为0.838,C.R值为0.848,AVE值为0.655。政府信任借鉴了芮国强和宋典的量表<sup>[3]</sup>,仁慈和能力维度各三题,忠诚维度四题,三个维度的 $\alpha$ 值分别为0.729、0.841、0.934;C.R值分别为0.746、0.842、0.935;AVE值分别为0.498、0.641、0.784;政府信任的整体 $\alpha$ 值为0.921,C.R值为0.940,AVE值为0.645。政府质量借鉴了陈刚和李树的量表<sup>[4]</sup>,有三道题,它的 $\alpha$ 值为0.801,C.R值为0.807,AVE值为0.784。由于问卷所有题项均由一人填写,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问题,为减少同源偏差的影响,问卷部分

表2 效度验证分析

模型	分组	RMSEA	SRMR	CFI	TLI	X <sup>2</sup>	DF
7因子	仁慈;能力;忠诚;政府质量;社会责任感;公共事务;关心时事	0.060	0.063	0.951	0.940	273.754	188
5因子	政府信任;政府质量;社会责任感;公共事务;关心时事	0.080	0.072	0.908	0.893	359.980	199
3因子	政府(政府质量、政府信任);社会责任感;参与倾向(公共事务、关心时事)	0.099	0.083	0.857	0.840	455.928	206
2因子	政府(政府质量与政府信任);公民(社会责任感、参与倾向)	0.114	0.088	0.807	0.785	546.139	208
1因子	所有维度为1个因子	0.174	0.163	0.547	0.500	1000.55	209

[1]李春梅:《城镇居民公众参与认知、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2]陈良煌:《开放式创新社区用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3]芮国强、宋典:《信息公开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1期。

[4]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北京〕《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

题目采用了匿名和反向评议法。应用Harmon的方法检验同源偏差问题,将所有题目都放在一个潜变量上,它的RMSEA=0.174,SRMR=0.163,CFI=0.547,TLI=0.50, $X^2=1000.557$ ,DF=209,与多维度模型相比其效应值很差,见表2。同时由表3可知各变量之间没有大于0.65的相关系数,表明同源偏差不很严重,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均较好。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3。

表3 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ean	std	1	2	3	4	5	6	7	8	9	10
1性别	1.56	0.248	1.00									
2教育程度	2.31	0.668	-0.076	1.00								
3职业	3.12	1.865	0.055	0.263**	1.00							
4政治面貌	1.71	0.303	0.093	0.237**	-0.007	1.00						
5平均收入	1.96	0.652	-0.205*	-0.335***	-0.252**	-0.081	1.00					
6居住时间	3.49	3.187	-0.002	0.016	-0.008	0.128	-0.098	1.00				
7政府质量	4.28	1.335	-0.006	0.054	-0.030	-0.032	-0.031	-0.070	1.00			
8政府信任	4.61	1.052	-0.020	0.041	0.071	-0.200*	-0.102	0.070	0.517***	1.00		
9参与倾向	5.90	0.932	-0.000	-0.075	-0.054	-0.124	-0.014	0.170*	0.315***	0.468***	1.00	
10社会责任感	5.41	1.239	0.033	-0.018	0.086	-0.082	-0.098	0.066	0.197**	0.366***	0.635***	1.00

\*\*\*P<0.001, \*\*P<0.01, \*P<0.05, +P<0.10

应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由Model 1可知,政府质量对公民参与倾向的作用系数是0.214(P<0.05),假设1得到验证。由Model 2可知政府质量对政府信任有直接影响,作用系数是0.428(P<0.01),由Model 3可知政府信任会对公民参与倾向产生影响,回归系数是0.362(P<0.01),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应用Hays基于Bootstrap方法开发的Process3.1工具包对假设2进行验证,数据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整体效应值是0.205,直接效应值是0.06,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值是0.145,Z值=3.205(P<0.001),假设2得到验证。具体数据见表4。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 因变量	参与倾向 Model 0	参与倾向 Model 1	政府信任 Model 2	参与倾向 Model 3	参与倾向 Model 4
截距	6.090***	4.979***	3.216***	4.121***	-2.425
性别	0.002	0.012	-0.016	0.015	0.102
教育程度	-0.058	-0.084	0.064	-0.100	-0.003
职业	-0.040	-0.029	0.053	-0.051	-0.066
政治面貌	-0.238	-0.228	-0.394	-0.088	-0.148
平均收入	-0.051	-0.039	-0.041	-0.028	0.075
居住时间	0.108	0.131+	0.083	0.095	0.068
政府质量		0.214**	0.428***		
政府信任				0.362***	1.340***
政府信任*媒体接触					1.334***
政府信任*社会责任感					-0.204***
F	0.828	1.628	4.899***	2.815***	12.06***
R <sup>2</sup>	0.061	0.125	0.301	0.198	0.486
Adj R <sup>2</sup>	-0.013	0.048	0.239	0.128	0.445

\*\*\*P<0.001, \*\*P<0.01, \*P<0.05, +P<0.10

Model 4表明政府信任\*社会责任感对公民参与倾向的作用系数是-0.204(P<0.05), $\Delta R^2$ 显著,但效应值是负数,与假设相反,调节作用见图2。

为进一步理解社会责任感对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关系的影响,本研究继续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是否会因社会责任感而变化的问题进行探析。数据显示在个人社会责任感较低的情形下,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值是0.1793[0.0048, 0.3004],在社会责任感高的情形下,

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值是0.0146[-0.0395, 0.09020], 调节性中介作用的指数值是-0.0824[-0.1378, -0.0092], 调节性中介作用显著, 进一步验证了社会责任感的负向调节作用。

##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 政府质量对政府信任有促进作用, 此结论与孟天广和李锋<sup>[1]</sup>、李燕等学者<sup>[2]</sup>的结论相一致, 其原因是高质量的政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 提升公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结论表明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 政府部门应当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府质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2) 已有研究显示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会积极影响公民参与倾向<sup>[3]</sup>。本研究也表明政府信任对公民参与倾向有直接影响, 是影响公民参与的关键变量, 其原因是公民更愿意与比较清廉的行政官员接触, 更愿意与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公务员联系, 沟通社会管理问题, 也更愿意与那些具备较强能力的官员协作, 共同应对和解决公共问题。

(3) 政府信任在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发挥着“传导器”的作用。政府质量提升公民参与倾向的路径有多种, 如构建一个可以让公民参与更加便捷的网络化电子政务平台, 更快地响应公民反映的问题。但本研究表明政府质量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最重要的中间机制是提升了公民的政府信任感, 因为数据显示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值是0.145, 占政府质量影响公民参与倾向整体效应值的70%, 政府信任的中间角色非常重要。

(4) 社会责任感负向调节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关系, 且会弱化政府信任在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责任感也会直接对公民参与倾向发挥作用, 政府信任与社会责任感在解释公民参与倾向影响时有替代关系。

理论内涵:

(1) 目前, 政府质量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没有完全摆脱治理理论等框架的限制, 认为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本研究则表明在促进经济增长之外, 政府质量还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政府信任, 更加全面地揭示了政府质量发挥治理作用的复杂机制, 深化了对政府质量功效的理论研究。当前政府质量的研究仍以质性研究为主, 采纳的是宏观叙事为主的研究范式, 需要用量化研究方法丰富其理论和内涵<sup>[4]</sup>, 本研究采纳的实证研究方法丰富了政府质量研究的方法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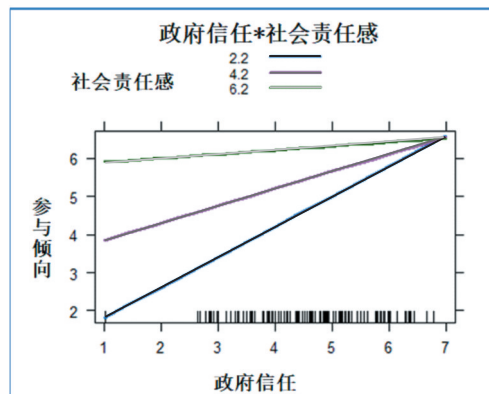


图2 调节作用图

[1]孟天广、李锋:《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绩效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的假说》,〔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2]李燕、朱春奎、姜影:《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3]Mijail Naranjo-Zolotov, Tiago Oliveira, Frederico Cruz-Jesus, José Martins, Ramiro Gonçalves, Frederico Branco, Nuno Xavier, “Examining Social Capital and Individual Motivators to Explain the Adoption of Online Citizen Participation”,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019, 92, pp.302-311.

[4]聂平平、万苏春:《国外政府质量研究:话语阐释、测评指标与研究困境》,〔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对公民参与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首先是借鉴详尽可能模型,将公民参与理论研究指向了公民参与实际行为的前因变量,即公民参与倾向,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公民是参与消极者还是积极者的问题。其次是将公民参与倾向研究与个人的主观规范相衔接,探讨了个人社会责任感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情境条件,探究了个体和政府因素对公民参与倾向影响的交互作用,同时将个体和政府因素纳入影响公民参与的研究框架中,是对现有公民参与理论研究的一种整合。

(3)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对公民参与倾向有直接影响,很少有研究将社会责任感作为影响个人意图的情境变量,尽管本研究的结论与假设的预期方向相反,但它也表明社会责任感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学术话题。

#### 政策启示:

(1)加快行政改革,进一步提升政府质量。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推进信息公开,建立科学、参与式的公共政策网络决策体制,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行政效率,加强廉政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供更多的参与渠道,提高与公民互动的能力,在公民心中留下“政府质量高,可信任程度高”的烙印,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倾向。

(2)提高公民政治意识,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提升公民参与倾向。公民参与会经历意愿、自觉、行动、反思等过程<sup>[1]</sup>,政府可通过多种方法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参与表达能力和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让公民尽早熟知参与过程中每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升公民的参与倾向。另外,政府应当对公民参与持开放、理解、宽容、接纳、欢迎的态度,通过与公民互联互通,提高公民的参与倾向。

(3)强化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由模型4可知社会责任感对公民参与倾向提升有直接促进作用,政府部门非常有必要通过价值理想、公民意识、国情和人文社科知识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公民参与倾向<sup>[2]</sup>。

#### 研究不足与改进:

(1)样本量有待增加,样本范围有待扩展,可在多个城市展开调查。

(2)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用来验证因果关系稍显不足,未来可以采用长期跟踪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面板数据来验证中介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社会治理效果在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传导作用,探讨政府文化、经济发展等变量在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构建形成一个包括社会、政府和个体三个层次、多个变量的政府质量影响理论,为全面理解政府质量的作用提供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

[责任编辑:史拴拴]

[1]孙柏瑛、杜英歌:《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参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2]包雅玮、程雪婷:《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17页。